

四大行信贷投放新增 500 亿元, 达上月同期两倍, 但短期贷款量超六成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持续疲弱

专家指出, 从 6 月份的情况来看, 超预期突破 9000 亿高增长的背后, 短期贷款增量占企业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超过六成, 为 4167 亿元; 中长期贷款仅占 25%, 一定程度上反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依旧疲弱。

■ 本报记者 王莹

据悉, 7 月前半月四大行新增人民币贷款 500 亿元左右, 这一投放量基本是上月同期的两倍。有分析指出, 按照四大行在新增贷款的占比推断, 7 月份信贷量将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预计全年新增信贷将在 8 万亿以上。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从而鼓励经济稳步发展。前期降息、稳增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

月末或再现突击放贷

“在日均存贷考核的监管环境下, 银行倾向于将信贷投放集中在月底”。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信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曹占忠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曹占忠还向记者透露, 这极有可能与银行自身的经营规律有关, 此时为其放贷高峰。所以, 前半月贷款增量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相比 6 月上半月, 四大行 7 月上半月的新增贷款 500 亿元, 并不多。虽然 6 月上半月只有约 250 亿元, 但下半年, 全面反弹, 整个 6 月份, 工、农、中、建四大行新增贷款约 1880 亿元, 6 月新增贷款达到了 9198 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当前经济形势下, 信贷投放增加企业肯定是获益的, 但有行业之



CNS 供图

分。银行对中小型企业贷款谨慎, 但会逐步加大对中小型企业贷款范围。

据了解, 传统企业由于盈利下降订单减少, 仍然不敢贷款。曹占忠指出, 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衔接并不好, 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资本投资项目难; 信贷投放增加看似利于企业, 但企业库存过多, 产能相对过剩, 资金对经济发展能起到多大的调节作用, 情势还不明朗。

谈及 7 月上半月新增信贷的具体结构, 曹占忠指出, 从 6 月份的情况来看, 超预期突破 9000 亿高增长的背后, 短期贷款增量占企业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超过六成, 为 4167 亿元; 中长期贷款仅占 25%, 一定程度上反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依旧疲弱。

市场对于 7 月份的整体信贷投放规模亦未给予高期望。未来将面临更大规模的逆回购到期。国信证券有关人士指出, 建议投资者仍多看少动, 静待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并导致市场出现可靠的上升趋势

后再行动。

另外, 四大行往往会在月末以票据虚增规模, 完成月度指标。5 月新增贷款不到 8000 亿元, 票据融资有 2320 亿元, 处于较高水平, 显示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不旺。而 6 月, 工、农、建三大行票据融资均呈现负增长, 整个金融机构当月票据融资也仅增加 340 亿元。有分析师认为, 6 月票据融资意外大幅缩减, 应该是商业银行主动调整信贷结构所致。如果商业银行愿意进行票据贴现, 企业仍有动力进行票据融资, 而不是选择一般短期贷款。

信贷松动空间 未大幅惠及中小企业

“信贷政策微调, 基本上是定向宽松, 主要是集中在中小企业贷款、住房保障贷款和一些在建项目。”民族证券分析师张景曾在近期撰写报告中指出。事实上, 银行个贷业务并未出现明显的放松, 而不少中小企业客户仍需排队放款。

据了解, 尽管今年以来信贷额度比此前略有宽松, 但信贷方面变化不大, 尤其是对房地产等严格限制放贷的行业而言, 暂时还没有放松迹象。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司业务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该行约 6 成新增额度投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包括铁路、保障房项目等。

曹占忠指出, 尽管国家鼓励对小型微型企业实行信贷松绑, 但是不少中小企业企业的贷款供给提升会更明显。”当问及信贷放松对中小企业贷款情况的影响时郭田勇说道。

据了解, 目前公司业务中还是要满足部分重点项目的贷款, 而个别大型企业贷款利率也从上浮 10% 提高到 10%—30% 不等的范围, 相比之下, 大银行放贷的冲动更强, 而随着信贷放松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也有所上涨, 普遍涨至 30%—50%, 此外, 还有 10%—30% 不等的一次性手续费。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银行催贷风暴是釜底抽薪

“ 银行的催贷风暴对许多企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骨里吸髓, 失去造血能力的企业只有死路一条。因此, 对于银行来说, 把企业逼死未必对自己有利。”

■ 本报记者 任腾飞

因产业空心化和资本虚拟化带来的民间借贷危机正向银行体系蔓延。今年以来, 浙江省不良贷款率整体上升。银行陷入恐慌, 催贷之风很快席卷了浙江民企之间庞大的互保圈。

互保, 这种曾经备受民企推崇的对抗风险的方式, 一夜之间变成了捆绑式的链条危机。7 月 16 日, 据浙江省金融办证实, 杭州 600 家知名民营企业近日联名上书向省政府紧急求助, 请政府帮助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

这是继温州高利贷危机爆发以来, 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又一波资金链风暴。以往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模式为什么突然失控? 银行为什么不分对象大面积收贷? 这种危机应该如何化解? 带着相关问题, 日前,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民企不良贷款率上升引发银行恐慌

《中国企业报》: 这次银行收贷事件之所以牵连多家企业, 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互保”。首先, 请您简单谈谈“互保”这种模式。

周德文: 浙江从事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可抵押物一般比较少。银行为了控制风险, 往往要求企业追加担保单位或者企业法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互保及联保作为创新的信用模式, 不仅能够解决部分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题, 也帮助银行防范金融风险, 曾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模式。

《中国企业报》: 既然是一种创新的风险防控模式, 为什么浙江的银行现在大面积催贷?

周德文: 这主要是由于民企不良贷款率上升引发了银行恐慌。自去年 10 月份起, 浙江部分银行的不贷款率就有增长趋势。今年以来, 浙江出现了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整体上升的情况。年初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约为 0.93%, 目前大概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导致浙江民企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担保网络出现断点。换句话说, 是有些企业出了问题。

比如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因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 使得为其互保、联保的上百家杭州企业受到牵连。这种互保“断点”不止天煜一家, 由一家企业出现问题造成关联企业脱保, 使得相关银行担心贷款风险而采取收贷行为, 同时引起其它银行仿效而进行跟风收贷。因此, 出现大面积催贷现象是不难理解的。《中国企业报》: 据您了解, 此次互保圈危机中, 有不少行业龙头、知名企业、中国民企 500 强卷入。这些企业本身运营良好, 实际上属于优质企业, 却也遭到多家银行“挤兑”, 请分析下银行收贷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周德文: 在较好的经济形势下, 企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互保与联保能够做到有效的风险控制。但是, 如今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 税收、原料价格、用工成本等等都可能成为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更加重视资金风险, 回收贷款成为头等大事。由于银行忽视对企业的信息调查, 不管是放贷环节还是收贷环节都过于依赖互保等风险控制模式, 因此在出现问题时, 银行盲目收贷和跟风收贷导致风险蔓延, 将很多优质企业拖下水, 甚至导致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政府应帮助优质企业渡过难关

《中国企业报》: 您提到银行“过于依赖互保等风险控制模式”, 同时“忽视对企业的信息调查”。这是否意味着, 银行从放贷之时就没有做到有效的风险控制? 同时, 为“劣质”企业担保的企业是否也有责任?

周德文: 银行通过各种手段转嫁风险本无可厚非, 但是“放贷有风险, 银行需谨慎”, 在放贷之日起, 银行实际上应该对企业的还贷能力进行有效的评估。如果没有经过评估, 或者经过评估后发现企业缺乏还贷能力, 却倚仗互保等转嫁风险的方式依然对企业进行贷款, 的确有一定的盲目性。在出现问题时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收贷, 则属于对自己风险控制责任的一种推脱, 对有些优质企业也不公平。

《中国企业报》: 请您谈谈银行过度催贷、加紧抽贷可能造成的后果, 以及当前应该注意的首要问题。

周德文: 银行是收贷行为的主角, 企业处于被动地位。银行的催贷风暴对许多企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骨里吸髓, 失去造血能力的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被逼上绝路的企业主, 可能选择纷纷“跑路”。因此, 对于银行来说, 把企业逼死未必对自己有利。

当下, 互保圈危机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因此, 目前首要的问题应该是把局面稳定住, 防范危机进一步扩大。要加大对着火源头——出问题的企业的治理工作, 通过设立一道“防火墙”, 比如尽快对这些问题企业进行资产重组, 以减轻这些问题企业给银行和互保圈其它企业带来的压力。

《中国企业报》: 目前, 某些地方政府甚至拿出财政资金帮助企业“转贷”, 有专家认为, 类似行为“完全模糊了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应该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为企业还债的行为?

周德文: 企业“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在各地并不少见, 有些甚至“绑架”了地方财政。财政资金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 不是用来为某个企业服务的。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企业是某个行业的龙头和标杆, 是某地的口碑和形象, 政府就出钱替它偿还债务, 只能说是一种出于政绩考虑的短视行为, 甚至有违法的嫌疑。但是, 如果是关系到重大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事件, 政府通过拯救一个或几个企业能够化解一场大范围的危机, 则正是财政资金用于公共服务的体现。

在互保圈催贷危机中, 银行跟风收贷是一种群体行为。由于需要救火的点很多, 政府调节的难度很大, 很难从根本上完全消除。同时, 卷入这场危机的许多企业本身并不缺乏盈利能力, 只是由于受银行盲目收贷而陷入困境, 并且由于自身被收贷而波及更多的企业被“株连”。处理大事件首先要抓住问题的关键, 这些影响较大的优质企业是互保网络中比较关键的节点, 如果政府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 挽救和造福的将远不止一家或几家企业, 而是一个区域的经济。

李慧忠: 货币政策仍有很大空间

■ 本报记者 王敏

“随着 CPI 的进一步走低, 相信货币政策调整的步伐将会加快。而且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仍然不小。当然, 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不应该仅仅由可能被扭曲的数据说了算, 而应该由无法扭曲的指标, 包括中小企业的实体经济生存现状以及老百姓的幸福感受了。”近日, 针对国家统计局 7 月 13 日发布的二季度 GDP 数据, 高和资本金融分析师李慧忠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二季度真实 GDP 可能比 7.6% 还要低

《中国企业报》: 2012 年二季度 GDP 增长 7.6% 的数据刚刚公布, 便有专家大声疾呼“中国经济已经跌破相”。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李慧忠: 其实, 我个人觉得, 二季度真实的 GDP 很可能比 7.6% 更糟糕。我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不应该仅仅由可能被扭曲的数据说了算, 而应该由无法扭曲的指标, 包括中小企业的实体经济生存现状以及老百姓的幸福感受了。

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 在我国经济转型中, 唯 GDP 增长至上心态必须转变。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无论人均 GDP 增长率或是年均 GDP 增速或是 GDP 增长总量, 中国都是世界经济增长史上一个奇迹。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习

“ 快速下滑的不仅仅是经济数据, 更是市场信心。或许我们不必对经济过分悲观。随着 CPI 的进一步走低, 相信货币政策调整的步伐将会加快。”

惯了这种 GDP 和财政收入“双高”增长的局面。但我们必须同时看到, 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 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建立在巨大环境损害和资源消耗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这已经是共识。

《中国企业报》: 如何理解“无法扭曲的指标”?

李慧忠: 有几个指标是无法扭曲的, 比如发电量。发电量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指标, 它统计的覆盖面和准确度更高一些, 无论是大型企业或是中小型企业, 都属于统计范畴。而且收费的事, 相关部门有足够的动力进行严查。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GDP 增速, 2012 年 6 月份我国的发电量当月同比增速为 0, 并且连续 3 个月一直徘徊在 0 附近, 这种情况从 2000 年到现在, 只有 2009 年的 3 月 (-1.32%)、4 月 (-3.5%)、5 月 (-2.67%) 出现过。而当时对应的 GDP 增速只有 6.6%。更久这一数据是从 2000 年以来, 甚至更久的时间维度, 中国 GDP 增速的最低值。

货币及汇率政策 有调整空间

《中国企业报》: 对这样一种态势, 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李慧忠: 心理学中有一个心理定律, 即悲观者的眼中没有彩色。快速下滑的不仅仅是经济数据, 更是市场信心。或许我们不必对经济过分悲观, 因为政府手中还有许多牌可以打。首先, 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非常大。随着 CPI 的进一步走低, 相信货币政策调整的步伐将会加快。过去该拐弯的地方没有拐弯, 不久的将来势必是急转弯。不仅是利率政策将持续下调, 包括存款准备金率, 也将持续下调。

其次, 财政政策有“底线级”的政策储备。与欧美国家不同, 我国政府推动的财政政策往往有明显的短期效果。如果经济进一步下滑, 跌破了中央的政策底部预期, 势必将加快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 大幅度放开地方政策投资冲动。虽然“4 万亿”的后遗症非常明显, 但中央总会有一些底线级别

的政策储备。

再次, 汇率政策仍值得关注。从统计数据来看, 欧美市场从全球进口的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大幅减少。而从中国的进口量减幅却很明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反思当前的汇率政策, 反思是否上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尺度过大? 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 是否给实体经济留有了充足的转型期?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 是否需要重新调整汇率政策的节奏?

下半年财政投资 将加大力度

《中国企业报》: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减税是不是一项不错的措施?

李慧忠: 减税固然是项好措施, 但我个人对减税不抱太大的希望。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 63795 亿元, 同比增长 12.2%。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54932 亿元, 同比增长 9.8%。不难发现, 上半年的 GDP 增幅从去年的 9.6% 回落为 7.8%, 同比只下跌 1.8 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却从 31.2% 下降为 12.2%, 跌幅达 19 个百分点。按照一般的逻辑, 经济快速恶化时, 政府应该减税以促进投资和消费。但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企业型的政府, 已经习惯于“为民做主”, 这种框架下政府更愿意把钱收上来再投下去, 而不愿意直接减税, 尤其是在土地财政大幅减少的背景下。再者, 下半年财政投资无疑将加大力度, 此时减税就是从政府口中抢饭吃。